

# 从“文治鼎盛”云端跌落的宋徽宗

——读伊沛霞《宋徽宗》有感

■唐骋华

宋徽宗大概是历史上最没争议的皇帝,古往今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出奇一致——文化巨人,治国“小白”。他统治时期,北宋文化全面开花,文学、书画、瓷器……都达到巅峰。可他任用奸臣,挥霍无度,表面繁荣之下是断崖式下跌的国力。最终,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

这种描述,暗藏着一个判断,即宋徽宗对文化的追求与其帝王身份极不相称。当然,按照儒家的看法,帝王理应具备文化修养。但此处所谓修养,是指对儒家经典的掌握与运用。至于宋徽宗热衷的书画、琴艺、茶道,乃至马术、蹴鞠,实属雕虫小技,小玩怡情,沉湎其中问题就大了。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纵观宋徽宗所为,无不印证着“逸豫”二字,“亡身”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就这样,宋徽宗被牢牢钉在“昏君”的十字架上,在不合适的时间坐上了不合适的位置,酿成个人和王朝的双重悲剧。

美国汉学家伊沛霞却有意推倒这个十字架。在《宋徽宗》一书里她指出,后世对宋徽宗的评价,充满了后见之明——正因为靖康元年(1126)抗金失败,致使后世史家在总结教训时,倾向于把宋徽宗的诸多举措,尤其是他花大力气搞的文化事业,当成玩物丧志的证据及北宋覆灭的根源。但这是误解。实际上,作为帝王的宋徽宗和作为文化巨人的宋徽宗不可分割。他是艺术家这没错,但绝对不是一个心不在焉的皇帝。他主导的文化事业,有着特定的政治内涵,对统治术,他也同样娴熟运用。因此,伊沛霞笔下的宋徽宗满怀抱负,且不乏手腕,不同于以

往的刻板印象。

这似乎是在翻案。但如果把宋徽宗放置于北宋政治传统变迁的脉络中,就可以确信,伊沛霞的塑造相当有说服力。

北宋向来注重“祖宗之法”,士大夫以太祖、太宗创建的典章制度为万古不变的真理,敦促帝王们代代遵循。景德元年(1004)真宗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来自北部的军事压力大大缓解,北宋得以享受长久的和平。外部挑战消失,让士大夫更抱定祖宗之法,“清静无为”被认为是最妥帖的统治方式。

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王安石为相,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熙宁变法”一举打破了清静的政治传统,使北宋朝政呈现出积极进取的气象。神宗逝世后,年仅九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她起用司马光等保守派,罢黜变法派,恢复旧法,史称“元祐更化”。哲宗亲政后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召回变法派,启动二度改革。公元1100年哲宗病逝,其弟端王赵佶继位,即徽宗。

登基之初,宋徽宗试图调和变法派与保守派的矛盾,终因双方积怨太深而告吹。宋徽宗随即彻底转向变法派,任用蔡京、张商英等变法派担任宰辅,疏远保守派。他命人立“元祐党人碑”,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保守派大臣的姓名尽数刻上去,等于把他们加入了黑名单。

从这个角度看,徽宗继承的是父亲神宗、兄长哲宗的政治遗产。他不满足于仅仅做个守成之主,所以执政20多年都很勤勉。伊沛霞写道:“他并没有表现得玩忽职守,也从来没有取消过视朝或不看奏疏。他努力去理解大臣



《宋徽宗》

[美]伊沛霞著

韩华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们呈报的问题,哪怕是一些很复杂的技术问题。”宋徽宗很想有一番作为。

历史上评价某位君主是否有作为,依据的无外乎文治和武功。武功方面,宋辽间已保持和平百余年,无拓展余地。哲宗朝取得了对西夏的决定性胜利,留给徽宗的空间也不多。能出成绩的,就只有文治。

文治的内容,一是加强财政。宋徽宗接受了熙宁变法的成果,募役法、保甲法、市易法基本得到保留。在此基础上,或调整或新推盐茶、免役、常平等法,改善了朝廷积贫积弱的窘境。徽宗朝的财政收入大幅度提升,创下北宋之最。

二是兴文教。宋徽宗改革教育制度,建立了县学、州学、太学三级学制系统。崇宁三年(1104),全国共有21万名太学生,为此,朝廷每年要投入340万贯铜钱和50万石大米。宋徽宗还在汴京为

医学、算学、书画等设立专门学校。这说明他对“文教”的认识,不局限于儒家经典。

三是定礼制。在古代,礼制和社会秩序是划等号的,定礼制,相当于为社会立规。宋徽宗登基后,着手修订宫廷礼仪,推出《政和五礼新仪》。此举加强了皇权。

文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援助困难群体,使老有所养、孤有所托、病有所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提供社会救济。宋徽宗在汴京设立居养院,向无法维持生计的人供应食宿,并且重点照顾寡妇、鳏夫及孤儿、弃儿。他还命各地建安济坊,免费给穷人看病。

宋徽宗的雄心还不止于此。他创建宣和画院,培养宫廷画师,提高其社会地位,甚至让他们与士大夫平起平坐。他本人在书画领域的造诣也是世所公认。相传宋徽宗亲笔绘制的《听琴图》,属于宋画上品,一笔“瘦金体”更在书法史上熠熠生辉。他崇奉道教,广建道观,主持编纂了《新道藏》。他对建筑也有巨大热情,亲绘图纸,搜集天下奇珍,用六年时间,督造了皇家园林的典范——艮岳。

传统观点认为,宋徽宗是受蔡京等奸臣蛊惑,贪图享乐,不务正业。伊沛霞则分析,蔡京大权独揽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后世史家建构的,其实,宋徽宗对蔡京既重用又防范。一方面,蔡京被授予很高的地位,号为“公相”,凌驾于其他各宰辅之上。另一方面,其实权却遭到削减,政治能量被严格控制。宋徽宗还频繁以御笔、手诏等形式,绕过蔡京,直接向官僚系统下命令。

换言之,宋徽宗从未大权旁落,在帝王术方面,他不是个“小白”。

那么,宋徽宗近乎狂热地推动文化事业,动机究竟从何而来呢?真相很可能是他对“文治”有更高的追求。对宋徽宗来说,改善财政也好,兴文教、定礼制也罢,普通帝王都能做到,而他要做的是一个不普通的帝王。因此,他把自己打造成集艺术家、建筑家、诗人、学者于一身的帝王,要将王朝推向他梦想的“文治鼎盛”。

应该说,宋徽宗的理想蓝图完成度是比较高的,传统史家本该赞他为“圣主”,赞徽宗朝为“治世”。但问题在于,北宋的地缘环境发生了剧变——金取代了辽,之后转而南下,攻陷汴京,虏获徽、钦二帝。这就是靖康之变。

“靖康耻”深深刺激了士大夫,他们总结亡国之因,认为有近因和远因。近因是宋徽宗的“联金灭辽”战略。史家认为,攻辽不仅没达到目的,反而暴露短板,被金国看透。远因则是宋徽宗沉迷艺术,信用奸臣,使国力严重衰退,无力与金兵抗衡。

《宋徽宗》却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首先,对自身所处的地缘格局,北宋并无主导权。金取代辽,势必打破维持100多年的“宋辽和平”。这,宋徽宗左右不了。你可以说他应对失误,加速了灭亡,但金兵进犯有必然性,即便换成宋神宗,也未必做得更好。而将责任归结为他沉迷文化艺术,同样是忽略地缘变化。假设宋辽和平始终保持着,以徽宗朝的实际情况论,北宋不太可能出现致命的内部危机。那么很可能,宋徽宗将以“圣主”的形象留存于史书上,流传在民间故事里。可惜历史没给他这个机会。宋徽宗最终从文治的云端跌落,沦为典型的亡国之君。

## 值得礼赞的历史书写

——评海男《野人山·转世录》

■刘小波

海男的新作《野人山·转世录》(《作家》2018年第六期)是一部关于时间和历史、遗忘和生命的小说,作者选择了二战时期中国远征军的故事,在处理的时候采取了较为私人化的方式。小说通过一群因各种原因走上旅途的旅行者重返野人山的经历,穿插了对当年战事的回忆,在主旨层面表达了战争的残酷及其给人类个体带来的无尽伤痛,也表达了对老兵的致敬、对坚韧生命力的敬畏和对遗忘历史的痛心。

《野人山·转世录》在结构安排上有两条线,历史和当下;叙述者则扮演了双重角色,在现世是一名作家,而前世的她则是一名战地记者。当现世的作家与经历过那场磨难的人们相遇时,作者把自己想象成亲历者,完全沉浸其中。小说的第二条线是一群旅行者重返野人山的故事,在旅行途中一步步揭示出那段经历的残酷与悲壮。小说没有对战争正面展开书写,而是通过一个特殊的身份进行回溯——通过几位老兵的相遇来写那场战事。这群远征军人最终留下了什么,是收藏家收藏不完,也是旅行者探索不完的。

小说主要叙述了几位老兵的故事,看

似独立,实则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遭遇。旗袍女子周梅洁、牧羊少年的爷爷黑娃、收藏家的父亲,以及重返野人山时在野人部落所遇见的老兵,这些人的故事通过前世的回忆与现世的遭遇一点浮现出来。小说对战争的正面描写较少,而是通过坟墓、记忆、讲述,将那些残酷的画面点点滴滴呈现出来,比如关于运送粮食的描写,关于收藏家爷爷身体里的子弹,关于野人部落老兵失去的腿与臂等,都是如此。而关于周梅洁的书写贯穿始终。在叙述者的前世里,周梅洁因战争期间与丈夫离散,被带到缅北做了慰安妇,战争带给周梅洁的恐惧一直存在于她的心上,她能走出野人山,却无法走出自己心中的魔山;在叙述者的现世里,旗袍女子周梅洁开启了新的生活,并选择了自我遗忘,而叙述者也

选择隐去她痛苦的遭遇,但是很明显伤痛是无法真正被遗忘的。

海男的写作往往以个体化的情感介入宏大的历史之中,比如之前的《热带时间》。《野人山·转世录》中作者也采用了较为私人化的方式来处理这段宏大的历史,无论是自始至终的超现实书写,还是具有文体意识的小说文本本身都是如此,神秘书写与非自然叙事贯穿全书。小说中有一个场景,就是重返野人山的一群人在描述各自的前世,想象自己的前世,还有野人部落老兵描述关于轮回的奇异事件,这种非自然的书写在这样的主题中并不突兀。同时,这也是一部文体小说,海男自诩三分之一是诗人,三分之一是散文家,三分之一是小说家,而这部小说刚好既有小说的情节,也有散文文化的文笔,更有诗的意境。在《热带时

间》中作者将诗歌排印在小说中,而这部《野人山·转世录》则是诗和小说融为一体,浑然天成。这种小说的诗性化与海男的诗歌散文创作不无关系,近期她发表的长诗《幻生书》有很多意象和书写也涉及到了《野人山·转世录》的主旨。

这更是一部记录历史、祭奠魂灵之作。海男长期生活游走在云南边境,恰好是这段历史的发生之地,也许正是经历了多次的漫步与思索才换来了这部小说。尤其是转世轮回观的介入更能凸显小说的哲理性。这不仅是对战争的书写,更是从人性的角度思考人生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开篇两名女子走出野人山所创造的生命奇迹到全文结束时关于生命力的论述,作者始终在表达一种生命的坚韧品性,这也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时代精神。

战争的灾难与悲苦是无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的,作者对这些遭受战争变故的人物的命运进行了深度书写,对他们的遭遇进行了全方位呈现。当下战争题材被反复书写,但很多仅仅是赠题材的写作,而海男这种代入式书写则体现了一种虔诚的写作态度,既铭记了历史,更反思了现实。